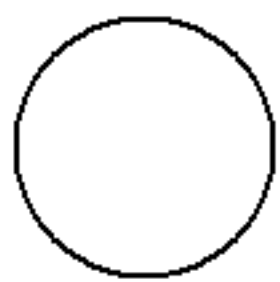


# 红旗

HONGQI



# 18

一九八三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 ★

## 目 录

### 关于斯大林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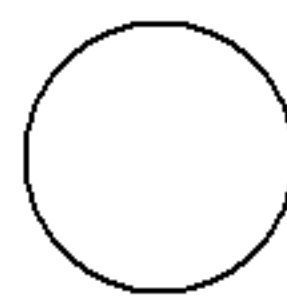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1)

在尼赫魯反华政策的背后……………徐景琳 (13)

### “不发达經济学”是新殖民主义的

“理論”……………黄展鵬 (25)

提高农村基层党組織的战斗力的……………魏文伯 (30)



☆ 九月十三日出版 ☆



# 关于斯大林問題

## 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斯大林問題，是一个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階級的反响，至今还在議論紛紛。各个不同的階級，代表各个不同階級的政党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国际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数人的意見其实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們同苏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違反列宁关于領袖、政党、階級、群众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說的，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對我們提出的原則性的論据，避而不答，只是給中国共产党人扣上了什么“个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帽子。

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的时候說过：“不回答論敌的原則性的論据，硬給論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爭論，而是謾罵”。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态度同孟什維克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尽管苏共中央公开信用謾罵来代替爭論，我們却要用原則性的論据，用大量的事实，来回答苏共中央公开信。

偉大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党和政府的



主要领导人，起初是列宁，在列宁逝世以后，是斯大林。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到现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近三十年之久。无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说，或者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说，斯大林一生的活动，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如果谁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共领导不同，谁就不仅被认为是“维护个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苏共的内部事务。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不能否认斯大林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这一历史事实，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的重大原则问题。苏共领导人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兄弟党对斯大林提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呢？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斯大林，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一九一七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



路綫，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偉大成就。

斯大林，他領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軍隊，进行了艰苦卓絕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偉大胜利。

斯大林，他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論著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貢獻。

斯大林，他領導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來說，实行了符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包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历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斗争，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調和的敌人。

斯大林的活动，是同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和偉大的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偉大的无产階級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为一个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階級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无产階級专政沒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离开了辯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須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經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錯誤。他在党和国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无产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錯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錯誤的主意。这些錯誤，給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損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



人，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必须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捍卫过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有些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所采取的态度，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掩饰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错误，而是通过他们的错误例子，“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应当符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更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修正主义者对倍倍尔、卢森堡的错误，只是“幸灾乐祸”、“欢喜若狂”。为此，列宁引用了俄国的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倍倍尔、卢森堡是“伟大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犯过错误，但他们始终是“鹰”，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一群“鸡”。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



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終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負責，所以我們党进行的反对“左”傾和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进行批評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实践經驗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們采取的方法是党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結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认为，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赫魯曉夫同志和苏共其他某些领导人，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

他們不是对斯大林一生的活动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盘否定；

他們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对待斯大林，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

他們不是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总结經驗教訓，而是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編造的所謂“錯誤”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們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用煽动的、蠱惑人心的語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当我们不得不列举这些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語的时候，我們实在担心弄髒自己的紙笔。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說，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內，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嗎？偉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这岂不是等于說，偉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三十年內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經驗，不是无产階級专政的經驗，而是在封建主义“暴君”統治下的經驗嗎？偉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强盜”。这岂不是等于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經在一个长时期內，是以一个“强盜”为首的国家嗎？偉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混蛋”。这岂不是等于說，在过去几十年中进行着英勇革命斗争的苏联共产党曾經是以一个“混蛋”为其領袖的政党嗎？苏联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白痴”。这岂不是等于說，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偉大苏联军队，曾經是以一个“白痴”为其最高統帥的军队嗎？光荣的苏軍将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战士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凶手”。这岂不是等于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内竟然把“凶手”作为自己的导师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包括苏联共产党人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賭棍”。这岂不是等于說，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曾經是以一个“賭棍”作为自己的旗手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內，絕對不能同意这种誣蔑！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是对偉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军队的莫大污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污辱，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魯曉夫，現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罵斯大林，究竟是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自己放在“凶手”、“强盜”的同謀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

赫魯曉夫这样咒罵斯大林，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共产主义的叛徒对斯大林的咒罵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对斯大林有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呢？

赫魯曉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瘋狂地反对苏維埃制度，反对苏維埃国家。在这方面，他所使用的語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和德热拉斯等叛徒，都毫无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人們正是应当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一段話来質問赫魯曉夫：“对偉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殘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偉大成果、在建設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說得出这种話”！





列宁在《谩骂的政治意义》一文中说：“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那些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在威胁着他们的苏共领导人，不就是用谩骂斯大林来掩盖自己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和恼人的软弱无力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口诛笔伐，一面对帝国主义的头子颂扬备至，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逻辑吗？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就应该记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曾经正确地谴责那些攻击斯大林的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颂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

人们如果把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讲的话，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讲的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到，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赫鲁晓夫如果不健忘，当然应该记得，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正是他自己，特别积极地支持和执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留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赫鲁晓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说：“雅基尔分子、巴利茨基



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曾经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曾经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肃反政策的赫鲁晓夫，为什么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千二净呢？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而赫鲁晓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自我批评，他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赫鲁晓夫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发生在现代修正主义泛滥的时期，并不奇怪。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批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时所说：“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弃、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证明，由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已经招致了何等严重的恶果。

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就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都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苏共领导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复燃，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谓第四国际的国际书记处，在《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说过，将来要“为受斯大林陷受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诺言将树立这个纪念碑。”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受斯大林陷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



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組織——第四国际的进展”。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苏共领导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苏共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进行的。

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恰恰相反，违背了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正确地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样的党，要求有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这样的领袖，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事业胜利的希望。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坚持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領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說，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历来坚持集体领导，但是反对貶低領袖的作用。我們重視領袖的作用，但是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頌揚，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提議，决定禁止給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我們这些一贯的、正确的主張，同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

事情越来越清楚，苏共领导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是为了什么发揚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苏共领导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揭穿來說，无非是：

一、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把党的領袖斯大林同党的組織、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

二、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三、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

四、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着自己的意願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

五、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打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赫魯曉夫提出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这种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頗为能干的。”

苏共中央公开信說，他們“在揭露个人迷信并克服其后果的同时”，“高度评价”那些“享有应得的威望的活动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苏共领导在把斯大林踩在脚下的同时，却把赫魯曉夫捧到天上。

他們把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赫魯曉夫，把这个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低級政治工作人員，吹捧成“紅軍的积极締造者”。

他們把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的巨大功績完全归功于赫魯曉夫，說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經常地听到赫魯曉夫的声音”，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



他們把核武器和火箭技术的偉大成就，完全归功于赫魯曉夫，說他是什么“宇宙之父”。但是，誰都知道，苏联造成原子彈和氢彈，都是斯大林領導时期苏联科学技术人員和苏联人民的偉大成就。火箭技术也是在斯大林領導时期奠定基础的。怎么能够把这些重要历史事实一笔抹煞呢？怎么能够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赫魯曉夫呢？

他們把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并且认为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的赫魯曉夫，吹捧为“創造性地发展和丰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光輝范例。”

苏共領導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口号的掩飾下所作的这些事情，正如列宁所說，实际上是“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誣蔑为“企图把个人迷信时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識形态和道德以及領導的方式方法强加給其他党”。这种說法，进一步地暴露了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荒誕无稽。

按照苏共領導人的說法，苏联在十月革命結束了俄国資本主义时期以后，又出現了一个所謂“个人迷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意識形态和道德”，似乎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个时期里，苏联劳动人民遭受了“沉重压迫”，籠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惧、怀疑和徬徨的气氛”，苏联社会的发展遭受了阻碍。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苏匈友好大会上的講話中大讲什么斯大林的“恐怖”統治，說斯大林“是用斧头維持自己的政权的”。他描繪当时的社会秩序說，“在那个时期，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来，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

苏共領導所說的“个人迷信时期”，簡直是一种比封建主义时期、資本主义时期还要“可恶”、还要“野蛮”的社会。

按照苏共領導的說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階級专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几十年来，并没有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并没有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只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以后，才解除了劳动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才突然“加速了苏联社会的发展”。

赫魯曉夫說：“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們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个时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誰呢？希特勒！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誹謗无产阶级領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鮮的玩艺，而是早已被人識破的卑鄙伎俩。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經用这类口号咒罵过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騙取馬克思对他的信任，曾經写信給馬克思說：“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第一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敗之后，就咒罵馬克思說：“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頂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經用这类口号咒罵过列宁。考茨基誹謗列宁“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說列宁把“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者东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样用这类口号咒罵斯大林。他說，斯大林是“专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創造了卑鄙的領袖崇拜，給領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

現代修正主义的铁托集团，也利用这类口号来咒罵斯大林，說斯大林是“个人极权制度中”的“独裁者”。

可見，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是从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铁托一脉相傳下来的，是他們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領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机会主义者們用詆譏否定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魯曉夫用詆譏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宁指出，特权地位并不能保证詆譏得到成功。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偉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做这样或那样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捍卫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打倒，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們劝告赫魯曉夫同志一句誠懇的話，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錯誤的道路，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來。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偉大革命学說万岁！



# 在尼赫鲁反华政策的背后

徐景琳

最近，联合反华的各路“英雄好汉”们，都在竞赛似地大造特造各式各样离奇的谣言，来诬蔑中国和攻击中国。别的反华“好汉”暂且不谈，这里单说说印度反动派尼赫鲁散布谣言，说什么中国军队在印度边境“大规模集结”，云云。

尼赫鲁在造谣上真不愧是一个“能干的”角色。他深懂谎话不可说得太死，而要模棱两可，闪烁其词。所以，他在散布“中国军队在北部边境集结”的谣言时，故弄玄虚地说：“我并不是说会爆发一次战争，但是我不能说不会爆发战争”。可是，他的下属们比起尼赫鲁来，未免略低一筹。他们竟说：中国已计划好以八月五日为大规模进攻的开始日。看来，造谣也需要才能。那些在造谣技术上比尼赫鲁稍稍低能一些的角色不幸，在于他们造出了一个八月五日的确切日期，很快地就揭穿了他们自己。

在这之后，狡诈的尼赫鲁一会儿说：中国在边界上“集中了大量军队”和“物资”，印度“要尽量增强我们的防御机器，以应付一切意外”；一会儿又说：“中国的声明表明他们不会再进攻印度”，但是“并不是说他们不可能

违背那些声明”，等等。可以看出，尼赫鲁由于种种需要，有时改变一下调子，但是，他始终咬定存在着什么“中国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必须“加强自己”，必须“尽一切力量，作好准备，来对付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

尼赫鲁在叫嚷“中国威胁”、“中国入侵”方面，忽紧忽松，忽而火烧眉毛，忽而影影绰绰，这都是以他的反动的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为转移的，都是他达到某种反动目的的手段。被现代修正主义者吹捧为印度“强有力的领导”和“明智”政治家的尼赫鲁，他的这套手段，特别具有深刻的目的性。

人们知道，尼赫鲁政府一贯乞灵于“中国威胁”的神话，来维持印度国内的“紧迫感”和“危急感”，以便勒索印度人民，镇压印度人民，以适应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需要。当他们叫嚷“中国入侵”迫在眉睫时，是想借此要求印度人民继续“负起军事开支的重担”，“过艰苦生活”，“作更多的牺牲”。当他们将“中国威胁”的神话变成一个似有似无的暗影时，是想既使“紧迫感”不致完全消失，又借此缓和一下内部矛盾，并鼓吹“加强自己”，即加紧扩



軍备战。

对外政策是对內政策的繼續。不論尼赫魯在反华上玩弄什么手法,他的目的不外是,企图以此来掩盖它的美国的政策、禍国殃民的政策,轉移国内人民的視綫,緩和統治集

团內部的爭吵和国内危机,并且借此討取更多的外援。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点,我們不妨来看一看在尼赫魯的反动統治下,印度国内的財政經濟方面的危机和政治方面的危机。

## 一、尼赫魯反华加深了国内财政经济危机

一九六二年是尼赫魯政府反华活动最瘋狂的一年。尼赫魯原来指望,通过制造边境冲突,乞取更多的外援,实行扩軍备战,以刺激国内生产,挽救它早已开始并日益严重的財政經濟危机。可是,事情发展的結果究竟怎样呢?

由于尼赫魯政府蓄意反华,捏造出莫須有的“中国入侵”的危險,不顾一切地扩軍备战,提高軍事預算,印度的財政危机弄得更加不可收拾。根据印度議会批准的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度財政預算,本年度軍事开支高达八十六亿七千四百万卢比,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强。后来印度議会又同意采取措施,使軍事开支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一。日本一家杂志評論这个預算时說:印度的扩軍活动已經使“印度空前地变成了一个具有軍事性质和通貨膨脹性质的国家。”巨大的軍事开支使本年度財政赤字空前龐大,高达四十五亿卢比,比上一年度的二十四亿卢比增加将近一倍,达到了印度独立以来的最高峰。

扩軍备战的結果,还使得印度原来存在

着的对外貿易逆差进一步增大。外貿逆差加深着外汇危机。近年来,印度軍事訂貨进口激增,出口則因物資轉用于国防需要而进一步萎縮。据估計,本年度軍事訂貨进口将增加十亿卢比,貿易逆差势将超过一九六二年的四十一亿卢比。加上本年度应偿还的外債本息等,外汇差額将越来越大,外汇危机将进一步恶化。

为了解决財政困难和外汇亏空,尼赫魯反动政府的办法之一是,繼續乞求外援,增借外債。

根据一九六二年四月《印度儲备銀行公报》发表的資料,仅从一九五九年三月底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底,印度四年累积外債共达一百五十二亿卢比。据印度財政部副部长去年九月在国会联邦院提供的材料,印度在第三个“五年計劃”期內,要偿付的外債本息共計六十九亿一千七百万卢比。在印度目前借入的新債中,有一部分必須抵付旧債,老債新債愈滾愈多。据英美报刊透露,为了解决今后三年的問題,印度需要从国外得到五十亿美元。今年六月日本出版的《日本





的动向》半月刊，在一篇题为《正在变成军事国家的印度》的文章中说，印度“外债越积越多，债台高筑，经济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尼赫鲁政府在一只手伸向外国的同时，另一只手就伸向人民的腰袋。为了应付巨额开支，印度政府拼命加紧榨取人民的血汗。去年，尼赫鲁政府在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宣布所谓“紧急状态”，又巧立名目，大搞变相捐税。如什么募集“国防基金”、发行“黄金公债”等，据估计，仅这两项，到今年六月止，印度政府就从人民身上捞去共六亿八千七百三十万卢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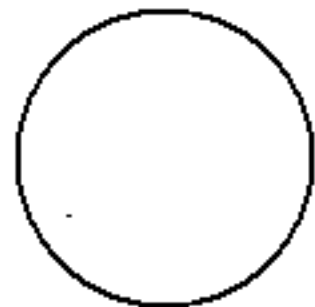
印度今年度的新预算中，规定增收的新税总数达到二十七亿五千万卢比，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取自普通老百姓的间接税。而由资产阶级和地主负担的公司税和财产税，总共只有三亿九千四百万卢比，即占百分之十四。印度《闪电》周刊说，印度政府“把总共二十七亿五千万卢比新税中的二十亿卢比的负担加在普通人身上”。这个新增税超过了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六个年度新增税额的总和。此外，各邦政府还将另行征收新税十一亿八千万卢比。从今年七月起又搞出了一个新花样，叫做“强制储蓄计划”，强制每月收入一百二十五卢比以上的职员和工人，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作为“储蓄”，五年之后始予归还。

这种空前巨大的赋税对印度人民意味着什么，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想要具体了解一

下印度人的情绪，不妨翻一翻印度政府把这个预算提交议会时的印度报纸。二月二十八日印度政府向议会提出预算，三月一日的新德里各家报纸上，便充塞着这样触目惊心大字标题：“创纪录的赋税”、“八十六亿七千万拨给国防费”、“邮电费增加”、“煤油、茶叶、肥皂涨价”、“强制储蓄计划”……。《印度时报》说，“预算建议的炸弹在星期四晚上炸开了，新增加的税收是那样的重，使这个首都目瞪口呆。”它还说：“对围在收音机旁收听关于预算的特别广播的人们来说，显然，一个节约和艰苦的新时代开始了……最大的恐惧变成了事实。”《政治家报》说：“老百姓对于新预算建议的反应是大声呻吟。”这家报纸报道：“一个家庭妇女问道：‘我怎样来平衡我的预算呢？我不能像德赛（印度前财政部长）那样用赤字财政的办法’。”人民感到愤怒。而尼赫鲁在一次讲话中却还号召人民实行“多工作”、“少花钱”的“自救之道”呢！

印度经济上的严重困难，还表现在工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印度“全国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据说“读起来很不是滋味”的报告。这个报告承认：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停滞不动”，工业发展“步伐放慢”。

据统计，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国民收入只增加百分之二。前一年度，即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



百分之七点一，相比起来降低了百分之五左右。工业虽經軍事訂貨的刺激仍保持上一年度的增长速度，但較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的增长速度，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就是与軍事訂貨关系密切的化学、机械工业，开工不足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而非軍用工业，如紡織、制糖、化肥及配件制造等，情况更坏。問題特別严重的是中小企业。全印一万家小型鑄造厂由于限制坩鍋进口而大部分倒閉；四百多家不銹鋼工具制造厂由于停止原料进口，連百分之五的生产都不能維持；在西孟加拉一地的七百家小型紡織厂，由于政府提高出厂稅而宣布停业；在北方邦的一千家榨油厂中，有六百家因为油籽稅增加和缺少油罐而倒閉或减产；等等。

在农业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的糧食产量，比上一年度减产一百二十万吨。印度的大米产量由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度的三千四百一十万吨减至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三千二百五十万吨，造成严重的粮荒。为此，印度政

府的糧食部长不得不“带着討飯碗到美国去”乞討。

由于物資匱乏，捐稅繁重，再加上商人囤积居奇等等，造成了物价的飞漲。据印度官方統計，今年六月份的批发物价指数比二月份上升了百分之六点四；与去年同期相比，米价上漲百分之二十五（在加尔各答竟为百分之四十三），砂糖为百分之五十四，布匹为百分之四十，日用品为百分之十至二十。至于零售价格，上漲的比率則更高。据印度全国应用經濟研究委员会估計，本年度物价的上漲有发展到“严重程度”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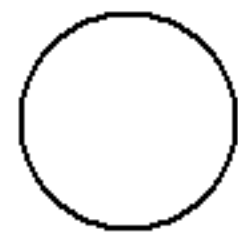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尼赫魯政府可悲地陷在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他企图通过軍事反华来挽救国内的財政經濟危机。而实行軍事反华、扩軍备战、橫征暴斂、大借外債的結果，却是財政赤字空前龐大，外汇拮据，工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物資匱乏，物价高漲，經濟情况更加混乱，大大加深了印度的財政經濟危机。外国报刊說：“印度在国内面临愈来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大有使經濟崩潰之势”。

## 二、一个大財閥的自白和尼赫魯坚持反华

尽管尼赫魯政府的反动政策，使国内經濟困难重重、險象丛生，然而，印度的大資產階級、大財閥和大地主，却繼續不断地做着反华、扩軍备战、大发橫財的迷梦。在他們看来，这样做，会給他們带来“丰硕的紅利”。

去年十二月四日，在《印度斯坦时报》上，印度大財閥甘·达·比拉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貪心的財閥，直言不諱地宣揚反华战争的“好处很大”。

比拉說：“战争引起的紧急感对于各方面的活动——不排除教育和科学方面的活



动——有极大的好处。”他说：认为“同中国的战争一定会大大损害印度经济并阻碍它的发展”的看法，“只是陈腐的臆测”。无需解释，在这个大财阀的话里，既有对印度国内财政经济危机的掩饰，又有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的实话。这位大财阀所说的“好处”，只是对大资产阶级的好处，这位大财阀所说的“印度经济”，只是大资本家们的企业。

现在我们继续听这个靠战争发财的大财阀说下去。他说：由于同中国作战，“我们可能要增加许多个师，以便增强我们的武装力量”，这样一来，新增部队的军官、行政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辅助人员的薪金“显然将造成额外的购买力，导致增加对一切日用品的需求，……然后，我们必须增加在军备、运输、铁路和公路、扩大军需工厂等方面花大量的钱。这一切都需要钢。所以我们必须增加钢产量，建立更多制造资本货物的工厂和制造厂，以便把钢变成各种战争物资、军备、铁路设备、桥梁、卡车甚至是资本货物。”“我们需要弹药，这意味着要扩大爆炸物的生产，也意味着增加化肥的产量。这样，化学工厂就被提上日程。……我们需要降落伞用的布、棉纱和棉花、篷帐等——这就是说，纺织工业需要生产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这就要求增添教育设施。”比拉总括了这一切说，实现了这些，就是实现了印度政府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在计划目标和战争生产的目标之间有密切的

联系。”好了，听了这篇异常精采的新夏洛克的骛麟自白，人们不难了解：印度大资产阶级是多么渴望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尼赫鲁政府的反华、扩军备战政策是多么适合大资产阶级的这种发财愿望。

从扩军备战中，印度的大资产阶级确乎得到了好处。官僚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军事订货的刺激下，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哄抬物价，确实发了横财。

请看看这几个数字：属于官僚资本的军火工业的生产总值本年度将达到十亿卢比，约为上年度的一倍和前年度的两倍。国家垄断资本的国营印度斯坦机床厂，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纯利达二千一百五十万卢比，占其股份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三。塔塔钢铁公司的毛利，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的一亿六千四百五十万卢比，增加到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二亿二千一百万卢比。属于那个比拉财阀的比拉黄麻厂的利润，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的一千六百零三万卢比，增加到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度的二千零七十三万卢比。达尔米亚水泥公司一九六二年的毛利达一千一百六十万卢比，比上一年增加一倍多。

发反华财的当然不止这些工业资本家，还有大批的商人、银行家、高利贷者等等，总之是整个印度大资产阶级都沾了光。

作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尼赫鲁政府的官老爷们的双手也没有空着。别的不说，且说最近印度各反对党提出



不信任尼赫鲁政府的动议中，有一条理由就是这个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七月间印度矿业和燃料部部长马拉维亚，因为贪污行为受到揭发，被迫辞职了。据外电透露，尼赫鲁政府的许多内阁官员在贪污舞弊案件中，都有牵连。英国《东方世界》今年九月号，有一篇文章指出：印度国大党头子们也被迫承认，那些在一九四七年还是一贫如洗的人，通过国大党的关系，然后又通过国大党同政府的关系，在十六年时间内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

很明显，尼赫鲁政府执行军事反华、扩军备战的政策，一方面使印度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混乱，一方面使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统治集团利用反华，混水摸鱼，大发横财。这就是尼赫鲁政府为什么在军费激增、外汇拮据的情况下坚持反华而不能自拔的原因。

看来，这种情况证明尼赫鲁现在所走的路子就是旧中国的最后统治者蒋介石所走的路子。旧中国的这个彻头彻尾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服务，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

的蒋介石，从反革命的內战起家追逐战争的利润，沿着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经济独占的轨道，走上了他的绝路。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用各种野蛮的方法，横征暴敛，来搜刮掠夺人民，一方面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主权，以取得外援来屠杀人民。蒋介石要从內战的持续和扩大中追求更大的财富，而他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没有穷尽，他们对内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兴趣也就没有穷尽。蒋介石倒行逆施，穷凶极恶，坏事做尽的结果，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终于被中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过去进行的是反革命內战，尼赫鲁曾经进行而且现在还在准备的是对外扩张，是反华的边界武装冲突，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共同的地方，是他们所进行的或者策划进行的战争的性质都是反动的，他们都企图通过进行战争或准备进行战争，来追逐高额利润，来投降美帝国主义，来维护大买办、大地主、大官僚对广大人民的反动统治。可以断定，只要尼赫鲁沿着蒋介石这条道路走下去，其结果也一定要走到同蒋介石一样的下场，这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

### 三、印度反动派不顾印度人民的死活

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发横财相对照，印度各阶层人民包括中等阶级的生活水平都已普遍下降，广大工农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是尼赫鲁政府不顾印度人民的死活，在“紧

急状态”的借口下，加强了对国内人民的掠夺和压榨的结果。

日本出版的《日本的动向》半月刊写道，现在印度全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人口陷于近乎饥饿的生活状态”。在直线上升的生活费用、各种名目的剥削、繁重的劳动和失业等几方面的夹击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达到惊人的程度。由于许多企业停工减产，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使失业工人的数目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纺织业危机就有十五万工人被解雇；而因尼赫鲁政府实行搜刮民膏的“黄金管制条例”一项，就使全国五十万金匠丧失生计。据印度报纸记载，目前有四万失业者靠“卖血糊口”；被迫走投无路因而自杀的金匠，到六月止，达到一百六十人之多。在业工人的生活与失业工人比较，只能是百步与五十步之差。生活费用因物价飞涨而大大增长，“紧急状态”以来，工人们又要经常为资本家加班加点，而工资并未提高。据印度劳工调查研究所今年四月报告，在北方邦坎普尔城的麻、毛、棉和皮革厂中，平均有百分之六十五点四的工人负债。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自七月份开始实行的“强制储蓄计划”，无异是火上加油。据印度官方估计，除铁路工人之外，受这一计划影响的工人，占全国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七到三十。

失业、饥饿、苛捐杂税，风雨交加地袭击着工人，城市无产者实际上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星期日报纸《人民报》，根据英国记者团的考察报告，发表了一篇关于加尔各答贫民生活的附有插图报道。据记者们的直接观察和调查，这个有六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有二十万人露

宿街头，有七十万人住在肮脏不堪的贫民窟里；这个城市还有一万九千个乞丐，三十万麻疯病患者，六十万肺病患者，有一百多万人在饥饿边缘上挣扎。报道继续说：“最使人痛心的是，加尔各答的将近一半儿童挨饿。”作者说，你可以看到小孩子们“胀得鼓鼓的饥饿的肚子和可怜的骨瘦如柴的四肢。”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人间地狱的图画啊！尼赫鲁统治印度十六年来，给印度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美好前途”，原来就是这样的。

印度农民的生活更为悲惨。在农村中，各种苛捐杂税的名目更多。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度新增加的捐税，有很大一部分是落在农民头上的。如各邦土地税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至百分之五十不等；中央与各邦巧立名目的各种新税每人平均分摊到十卢比；灌溉税和土地改良税都已提高。据印度报纸说，不久还将把“强制储蓄计划”推广到农村施行，规定凡每年缴纳土地税超过五卢比者，须另缴相当于税额半数的钱作为“储蓄”。据估计，此项“储蓄”总数可达四亿二千五百万卢比。负担是这样重，又加上农业减产，结果弄得农村凋零，农民生活异常困苦。印度的《闪电》周报说：一九四三年饿死三百万人的“大饥荒”的阴影已笼罩着广大农村。现在，有两千多万人的拉贾斯坦邦已正式宣布为“缺粮邦”；有三千四百九十多万人的西孟加拉估计缺粮二百二十万吨，据印报报道，该邦农村已数月未见米粒，每天一餐麦糊尚难保证，死于饥饿者日见增多，成千上



万农民外出逃荒，有的妇女靠卖身换粮，连小土地所有者也因缺粮而纷纷出卖土地。而在比哈尔邦的某些农村，农民已经是用树皮草根充饥，甚至“不顾死活吃有毒的野果”。印度报纸承认，今天印度农民的生活，已降至二十年来的“最低点”。

现在，连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级也愈来愈感到难以度日了。他们是政府增税计划的主要牺牲者，也是募集“国防基金”、“黄金公债”、“强制储蓄”的重要对象。自去年宣布“紧急状态”以来，他们的负担不断加重。有许多人还受到停薪的威胁，比如比哈尔邦政府的四百名雇员，今年已经有五个月没领到薪水。甚至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感到手头拮据。因为按照新的所得税条例，每年收入五千卢比的人，由原来纳税四十二卢比，增加到二百四十二卢比，再加上强制储蓄一百四十八卢比和附加税三十卢比，共达四百二十卢比，相当于过去税负的十倍！据今年八月英国《经济学家》刊载的一篇题为《印度国内动荡不安》的文章说：“高税和高价”，“这两个问题严重地打击了工厂及都市中受

薪的一般中产阶级”。这篇文章说：“本来每年收入二百二十五英镑的人，才要缴交所得税，但是，新计划规定，收入只要达到上述数字的一半以上就要缴交。说得清楚一点，这意思是说，除非你已把你的收入的百分之十一拿出来保寿险或作养老金，不然从上个月开始你会发现你的薪津袋轻了一点，有百分之三的薪水被拿去作‘强制储蓄’，等五年后始予归还。”有人说：他们的收入中不小的一部分是“拿米养政府的”。

现在，在印度，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为一方，以广大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阶级对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尖锐。有人描写道：“在豪华的旅馆和饭店门口，衣衫褴褛的乞丐伸着哀求的像爪子似的手等着，而里面，一瓶法国香槟酒或苏格兰威士忌要卖七个半英镑。”印度《闪电》周报在本年六月发表的一篇长文中说：“我们看到了富人变得更富——不仅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变得更富而且正是由于紧急状态而变得更富——的惊人情景”，“激烈的阶级仇恨正在积聚起来”。

#### 四、印度人民的斗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

还是那家《闪电》周报的同一篇文章说，印度政府“凭一纸空文的诺言来维持民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对于用自己的劳力、汗水、眼泪和痛苦换来的只是增添黑心的大企业的更大的财富的人们来说”，空洞的许愿、

骗人的谎言“再激不起他们的情来了。”真正一点也不错。面对着残酷的榨取、沉重的捐税、飞涨着的物价和凶暴的政治迫害，人民已被逼到绝路，不得不奋起为反饥饿、要活命而斗争。上述文章的作者怀着恐惧的心



情，以带有絕望的声調惊呼：“雷声在震响，危机和人心的沮丧像烏云一样压在我們的国土上空。”

人民反抗的風暴起来了。首先是受害最深的工人們，不顾尼赫魯政府的反动禁令，紛紛举行罢工、集会、靜坐示威，进行反对物价高漲，反对“强制儲蓄”，反对“紧急状态”，要求增加工資等斗争。罢工在各个方面此起彼伏地进行着，而且有許多发生在炸药、軍服、电力、石油、港口等部門；罢工的規模越来越大，参加者多至数千数万人。

在这一片罢工浪潮中，印度各地金匠反对“黄金管制条例”的斗争，很为突出。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由于尼赫魯政府实行“黄金管制条例”，千百万金匠被剝夺了生計，弄得走投无路，所以他們的斗争情緒特別激烈。全国五十多万金匠多次分別举行游行集会。在旁遮普邦一地曾有数千名示威金匠包圍了該邦财政部长的汽车；在古加拉特邦一地五千多首飾工人曾举行絕食抗議；在加尔各答的金匠和珠宝匠曾集会哀悼因失业而自杀的金匠；今年七月底，全印金匠工会还号召全国金匠发动“不合作运动”，消极抵抗“黄金管制条例”。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約有四千名金匠到尼赫魯的府邸外面示威。

最近，在孟买市爆发了一个大罢工的事件。罢工首先由孟买三万市政工人发动。市政工人們为了抗議印度政府征收重稅、物价上漲和“强制儲蓄計劃”，要求增加物价津貼

百分之二十五，从八月十一日午夜开始举行不定期罢工。五天之后，即十六日午夜孟买电力和运输业二万三千名工人，为支持市政工人的斗争也宣布罢工。一个星期后，这座城市的其他国营公司的工人和一些大旅館的工人也卷入罢工浪潮，大部分廚师、服务员、职员和清洁工都上街罢工，声援市政工人，据估計参加者約有十万人。接着又有一万二千碼頭工人停止工作，支持市政工人的斗争。到了八月二十日，工人罢工达到高潮。据英国路透社电，全市有一百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結果使得“孟买港口的航运完全停頓了。在城內运输工作也停止了”。全市陷于瘫痪状态。

在这期間，印度反动政府对工人采取了一系列殘暴的镇压手段：逮捕了近千名工会领导人和罢工工人；警察“襲击了这个城市各地和郊区的市政工人住宅”；孟买市政府“向罢工工人发出限期复工不然就要被解雇的最后通牒”；发动全市警察守卫政府机构和交通要道；等等。在反动政府的高压下，孟买工人坚持十天的罢工于二十一日上午停止。

这里要提一下，叛徒丹吉在这次罢工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他公然反对工人群众要活命的罢工斗争，要工人等待他去同印度政府和資本家开会商量，以便成立“平价商店”和“合作社”等等。这真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墮落到极点了的一个例子。挂着共产党招牌的这个丹吉，連工人爭取生存权利的罢工斗



爭都要反对，都不允許，而只允許他自己这个背叛、出卖了工人階級利益的壟断資產階級的奴才，去向反动政府和大官僚資本家乞求恩惠和施舍。丹吉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还不清楚嗎？

不論是尼赫魯政府的鎮压也罷，修正主義叛徒的破坏也罷，工人們为活命而进行的斗争，是无法制止的。印度的一家报刊《自由新聞》就这样写道：“在工人中間出現了一种新的战斗精神，它是自紧急状态开始以来未曾見过的。人們不再认为罢工是反社会的了，不管有沒有保卫印度法。至少我們已經在孟买碼頭看到一次大規模的罢工。另外，有可能在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工业地区出現更多的罢工。”这个报纸承认：“工人們對我們最近的一些政策是如此憤怒”，“印度的劳工今天处于一种近似革命的心理状态”。

工人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受到尼赫魯政府反动政策危害的还有广大农民群众。在生产破坏、粮食歉收、賦稅增重、迫害加强的凄風苦雨的生活条件下，印度农民也感到难以为生了。日本广播协会記者报道說：“我最近到新德里附近的农村时，听到了对尼赫魯总理的强烈的批判和对执政党国大党的强烈的不信任的呼声”。这位記者“感到意外”，但是他肯定对“尼赫魯总理操纵的国大党，产生了强烈的批判，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英国《泰晤士报》五月二十九日刊载該報記者从新德里写的一篇报道說：尼赫魯政府的政策“在乡村中引起很大的憤慨”。日益增长的积

聚起来的憤慨情緒，必然轉化为反抗行动。据印度报纸的零星透露，今年以来，在印度一些地方曾发生过憤怒的农民反对政府征用土地的斗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北方邦的二十多个村庄的五千多农民，四月間曾为此到尼赫魯住所前举行静坐示威。外电报道說，今年六月間，在阿薩姆邦首府西隆以南的三个山区县，有当地的部族农民举行武装反抗。

印度的知識界的严重不滿情緒，也在增长。青年学生，一方面受到經濟动蕩、物价高漲的影响，高昂的學費、書費、公共汽車票價使他們的求學受到威胁，于是他們发动了許多次要求降低这些費用价格的罢課請願活动。另一方面，他們不滿尼赫魯政府压榨国内人民的政策，同情工人农民的悲惨遭遇，他們还多次地参加了工农群众的反饥饿的斗争。特别是在尼赫魯政府借口反华，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結，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让“美国之音”在印度轉播的合同，和印美英“空防”协定之后，青年学生更是群情激憤。在新德里，青年們游行至尼赫魯官邸示威；在加尔各答，学生們向邦議會递交了抗議书。广大知識界的上层人士也感到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一种对現狀和前途的不滿和忧虑攪住了他們，促使他們站出來說話，表示不同意尼赫魯的某些内外政策措施。在这种形势下，甚至那个一向支持尼赫魯的、被称为“活甘地”的所謂献地运动的領袖巴維，最近也公开表示反对“印度保卫法”和繼續監禁印共





党员，說“印度最大的敌人是贫困而不是中国”，說“如果我们进口美国粮食、美国武器，以致靠美国人出主意来解决我们的問題，那我们的独立还剩下些什么呢？”

由于受到国内壟断資本的排挤和美国資本的威胁，加上高稅收、高物价的打击，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愈来愈不滿。

面临着人民反抗斗争的兴起和高漲，印度的統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尖銳化起来，呈现出—幅“山雨欲来風滿楼”的图景。我們記得，尼赫魯在制造反华事件后，曾吹嘘全国的“团结—致”，直到七月份，他还在那里硬說什么“印度全国空前的異乎寻常的团结—致”，“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忘記了无聊的爭吵”。可是，无情的事实却是那些“无聊的爭吵”不仅沒有“忘記”，反而加剧了。目前，整个統治集团四分五裂。在西方記者的笔下，今天的尼赫魯政府是一条“无人掌舵”，“正在下沉的船”。

印度的《經濟周刊》也招认，尼赫魯实行反动政策的結果已使他本人扮演了“自己—手造成的局面中的悲剧角色”。

作为这一句話的注釋的事实是：

### 五、印度反动派必将彻底破产

摆在尼赫魯面前的就是这样—副烂摊子。怎么办？这个問題折磨得尼赫魯寢食不安，非常头痛。外电报道，近来他在公开場合出現时，都显出“精神恍惚”，倦容十分。

“許多平素自詡为最接近他的人都成了他的最尖銳的批評者”。原来屬于尼赫魯派的許多人物看到大势不妙，正在随風轉舵，紛紛出来反对尼赫魯，弄得尼赫魯众叛亲离，統治失灵。

省邦实力派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大权旁落。本来在印度所有各省邦中—向就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自从去年尼赫魯实行了軍事反华后，各邦当权派借口“紧急状态”，乘机利用职权，打击異己，使派系傾軋更加尖銳。

国大党外的极右翼势力抓住反“紧急状态”、反“保卫印度法令”、反增稅、反强制儲蓄、反貪污等題目，大作文章，掀起倒尼运动。就在八月十三日，印度議會开始辯論据說是“印度下院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泰晤士报》）由反对党提出的对政府不信任动議。由于国大党在議會中占压倒多数的議席，不信任案沒有通过，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統治階級内部的分崩离析，更不能解决印度国内的階級矛盾，也挽救不了尼赫魯反动統治的破产。現任印度內政部长的南达早已惊呼“国大党已进入危机时期”，“人們看到了国大党被取代的前景”。

这个投入了美帝国主义怀抱，充当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工具的尼赫魯，滿以为掀起—次新的反华浪潮，不仅可以轉移人民視綫，緩和国内危机，而且可以由于反华符合美帝国主



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而討得更多的外援。但是，和过去尼赫魯历次反华結果一样，人民的視綫是轉移不了的，階級矛盾也不能因此緩和。

对于尼赫魯反华的种种手法所包藏的目的，印度人民和印度輿論界已經从几年来的切身体驗中，开始有了認識。

最近一些外国报刊的报道，多少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

西德的德意志新聞社八月二日报道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人們深信：“边界爭端的加剧是为了把人們的視綫从国内政治舞台轉移开。”

七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印度下层階級的一致意見是，印度政府正在牺牲穷人來增强自己的軍事力量。人們普遍認為，政府的政策和防禦措施使穷人变得更穷，而絲毫不去触动有权有势的富人。”

《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八月二十六日的一期說，尼赫魯設法煽起人民的所謂“爱国主义情緒”即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緒，“但是現在人們反应冷淡。”

至于尼赫魯为了乞求更多的美援，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进一步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工具，这种丧权辱国的行徑，正在激起人民的更大觉醒。

虽然印度的輿論界各有不同的背景，各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却不能不日益增多地反映了这种認識。《閃电》周报、《印度时报》、

《自由新聞》、《联系》周刊、《政治家报》等，曾連續发表社論、文章、漫画、讀者投书或致尼赫魯公开信，抨击尼赫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拴在美国政府的宣傳車上”，“美国之音”淹沒了尼赫魯的“不結盟”的濫調，“空中保护伞从后門进来”，使西方国家“想在什么时候进入印度就能进入”，从而“出卖了主权与独立”，“背叛了国家”，“拔掉了不結盟老根子”等等。《閃电》周报曾經說过这样一段話：“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独立用盘子托着奉獻給征服者，也并不是所有征服者都是带着劍的。如果拉丁美洲、西亚、甚至西欧的现代史对我们有所教益的話，那就是：在本世紀下半叶，民族独立是以‘对付共产主义的共同防禦’的名义逐步被蚕食掉的。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在这条滑溜易摔的道路上蹣跚而行，卫星国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印度人民开始觉醒了，任凭尼赫魯之流使用什么手段，也蒙蔽不了人民的視綫；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人民还会更进一步地认清尼赫魯政府的反动面目。

代表印度大資产階級、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利益的尼赫魯政府，在反华烟幕下，对国内人民越是加强鎮压、掠夺和压榨，对外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只会越发加深它的經濟危机和政治危机，尽管他还能苟延殘喘一个时期，但終究逃不了彻底破产的結局。



# “不发达经济学” 是新殖民主义的“理论”

· 黄 展 鹏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英、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谈所谓“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且把“不发达经济”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称之为“不发达经济学”。

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儼然以“科学研究”的姿态出现，说什么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从近代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是“切合学术研究的目的”的。他们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面孔，为所谓“不发达国家”“寻找”贫困和落后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提出了一些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理论”和“方案”。迄今为止，所谓“不发达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各个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争论，但是，几乎所有这些经济学家们都异口同声地鼓吹以下几个论点：一、“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二、“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已经放弃了剥削和掠夺；三、“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为了协助“不发达国家”取得“独立”。

事情是不是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呢？我们不妨分别考察一下这些论点。

“不发达经济学”的“专家”们认为，“不发达国家”需要“发达国家”援助，是由于“不发达国家”贫困和落后。他们为“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落后“寻找”出种种的原因，诸如：迅速的人口增长率，外部经济不发达（市场规模小），缺乏经济发展精神，没有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等等；<sup>①</sup>而大多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资金。“不发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纽克斯在《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论点，他说，“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低，储蓄的能力小。实际收入低是生产力低的一种反映，生产力低主要又是由于资本缺乏。资本缺乏是储蓄能力小的结果，这样完全形成了循环关系。”<sup>②</sup>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唯恐人们不相信“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真实感”，特意作了如下的表白：“我们

① 参见：美国纽克斯：《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形成问题》一书，1953年版；印度辛格：《经济发展的机械力学》，1952年8月号《印度经济评论》。

② 美国纽克斯：《不发达国家中资本形成问题》，1953年版。



不希望有人误解，认为我们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像模式（指“贫困的恶性循环”——引者注）里所表现的那种情况，或者模式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sup>①</sup>乍一看来，这个奇特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术语确实有些费解，但揭穿了，也不难了解，这就是说，“不发达国家”生产力之所以低，“是由于资本缺乏”；“不发达国家”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因为它自身的“经济增长率始终等于零”<sup>②</sup>。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不发达国家”要摆脱贫困和落后，除非依靠外部力量来突破这个恶性循环，否则就很难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将不仅是一种友好的帮助，而且是一种经济上的必要。”<sup>③</sup>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口中的“发达国家”，当然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

既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说成是医治“不发达国家”贫困和落后的药方，那么，就让我们以智利为例，来检验一下他们所吹嘘的“理论”吧。

据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去年宣布，在最近十七年中，美国为智利提供了六亿五千万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一亿美元的“赠款”和五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去年三月间，以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古德温为首的美国使团到智利访问时，还答应在今后五年内为智利提供四亿七千万美元的新贷款。亲美的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上台以来，对“美援”的依赖愈来愈加深。智利财政部长路易斯·马凯纳承认，一九六二年的全部财政开支的百分之三十将由美国贷款提供资金。美国新

殖民主义者对这个所谓“不发达国家”所下的赌注是颇为可观的。

按照“不发达经济学”的这种“理论”，“不发达国家”一旦接受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就可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那么，智利既然接受了美国的“巨额资金”，它是不是变成了经济发达的国家或者已经开始明显地走上了经济发达的道路了呢？关于这个问题，智利的经济状况是最有力的回答。

智利自从接受“美援”以来，特别是从亲美的亚历山德里一九五八年执政以来，执行了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它的所谓“稳定经济计划”。所谓“稳定经济计划”，就是要实施冻结工资、压缩就业、货币贬值、削减国内信贷等等措施；这样做，名义上是促进智利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却导致了这个国家工农业生产的萎缩。在美国商品的打击下，智利的民族工业企业的开工率，在一九六二年只相当于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农业的衰退使这个国家每年要付出一亿美元以上的外汇来进口食品。工农业生产的不景气，造成了大量的失业者，在这个只有二百万职工的国家中，失业人数竟达二十万。物价飞涨不已，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事实胜于雄辩。美帝国主义对智利这个“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大量“援助”，并没有突破这个国家的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没有使这个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态，恰恰相

①② 鲍尔和耶梅：《不发达经济》。美国《科学》杂志1959年11月20日。

③ 见瑞士《吉克洛斯》杂志1962年第1期。



反，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促使这个国家更加陷于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的悲惨境地。

在所谓“不发达国家”中，由于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经济落后是个事实。在这些国家争得民族独立之后，为了尽快地发展国民经济，主要地应当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争取一些外来的经济援助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援助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了消除所谓“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对“发达国家”的“援助”的疑虑，资产阶级学者煞费苦心地为这种“经济援助”涂脂抹粉。他们宣扬帝国主义的“援助”已经放弃剥削和追逐利润，说什么“发达国家”已经“停止对落后地区的剥削，而以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政策的目标”；西方国家准备“把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所拿走的一切东西还给非洲”；还说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富国以相当大的款项帮助穷国，这种支出有着明确的开发的目的”，按照美国援外计划“所提供的资金，同私人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帝国主义的投資不能不有所区别”；如此等等。

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援助”吹得天花乱坠，但是，美元源源不断地从“不发达国家”流进殖民者的腰包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里，以美国从拉丁美洲攫取高额利润为例，就可以窥见一斑。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维克托·佩洛去年在一篇文章中说，最近两年来，拉丁美洲各国从美国政府那里

取得了总数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的贷款。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却向美国付出了三亿五千万美元的借款和一亿四千二百万美元的利息和佣金，即实际上，这些国家只得到了一亿一千一百万美元的“援助”。在这期间，美国公司还从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投资中赚取了十六亿美元的利润。这就是说，在这两年内，美国从拉丁美洲国家拿走的美元，要比这些国家从美国那里得到的“美援”多十三倍。这也许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貝耳所说的“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之一吧。

再看看美帝国主义对非洲原料资源的掠夺吧。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四年间，美国从非洲运走了价值七十多亿美元的原料，相当于战前十四年的五倍。目前，美国每年由非洲输入的原料达五至六亿美元。美国把非洲作为它的战略和稀有物资的供应基地。美国研究关于“不发达国家”问题的专家尤金·斯坦莱在《后进国的将来》一书中公然说：“自由世界不能够让自己丧失后进国中的战略物资”。一九五六年，美国从非洲进口的钽占全部进口额的百分之七十九，钶铁矿占百分之七十八，钴占百分之七十六，锰占百分之四十二。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从拉丁美洲攫取几十亿美元的利润，从非洲掠夺大量的原料资源，这能说是殖民者准备“把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所拿走的一切东西还给”“不发达国家”吗？不！这些事实证明，所谓帝国主义已经“停止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已经放弃“追求利润”的“不发达经济学”“理论”完全是一种欺骗。事实也证明，帝国主义的剥削本性并没有改



变也不可能改变。连美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对外“援助”是为了追逐利润，为了本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死掉了的杜勒斯曾公然说过：“美国援助其他国家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否则我们是不给它们任何援助的。”美国负责执行“马歇尔计划”的霍夫曼更直言不讳地说：“从‘援外’拨款得来的红利，大概是我們至今用钱所赚来的最大的红利。”<sup>①</sup>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厚着脸皮宣传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为了“协助”“不发达国家”取得“独立”。去年，美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汉密尔顿说，“援助计划的目的是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技术，以便他们可以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

如果说这是指经济独立，那显然是一种欺骗。实际上，帝国主义正是通过“经济援助”这一渠道，渗入到“不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操纵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使之成为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萨尔瓦多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提供“援助”的结果，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电力、燃料、港口、铁路等重要经济部门；还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正如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哥斯达黎加《前进报》指出的，萨尔瓦多“国家主权已被作为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附属机构借款的抵押品”。

帝国主义既然在经济上要掠夺和控制“不发达国家”，所以，在政治上根本谈不上帮助“不发达国家”取得“独立”，而是相反，必然要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奴役和压迫这

些国家的人民。例如，美国政府给“美援”规定了許多苛刻的条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美国《哈泼斯杂志》主编约翰·费希尔给当时新上任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福勒·汉密尔顿的信中曾经说：“我知道你明白这个道理：美国在援外上每做一件事（或每拒绝做一件事）都是为了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所以我相信，你会在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勒紧这根链条。”肯尼迪在今年四月二日“援外”咨文中公然宣称，“美援”计划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几十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维护自由和希望，防止暴政或进行颠覆活动（应读作：镇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以“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貝耳则更具体地说：“美国一直大力主张在援助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国内改革。”进行什么样的“国内改革”呢？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尼迪政府前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说：受援国应当建立“一个可靠的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应读作：建立一个镇压民族民主斗争的忠实于美国的反动政府和行政管理机构）”<sup>②</sup>。伊朗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五二年，对于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的前首相摩萨台，美国政府以停止“援助”相威胁，并策动颠覆摩萨台政府。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美国又以“援助”支持亲美的萨希迪上台。

美帝国主义向来以援助为钓饵，搜罗一些国家的反动分子，充当美国对这些国家的

① 《纽约时报杂志》1952年2月3日。

② 美国《外交事务》，1961年4月。



人民进行奴役、掠夺和剥削的忠实奴僕。南越的吴庭艳集团，南朝鲜的朴正熙集团，就是在美国的金元和武器的支持下勉强维持他们的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的。用“美援”来反对和颠覆不“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的政府，用“美援”来扶植“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的反动政府，这怎么能说是协助“不发达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真实感”，实际上，倒不是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没有能力摆脱贫困和落后，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天生地“等于零”，这些宣传都是“没有丝毫的真实成分”。具有“真实感”的倒是帝国主义的經濟掠夺，造成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贫困和落后。由于接受帝国主义的“經濟援助”，使初步获得独立的国家又重新丧失了独立，原来經濟落后的国家它们的經濟更趋恶化，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化，这就是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被压迫民族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真实感”！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为“經濟援助”所造成的恶果辯解，说什么帝国主义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所以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是因为受“援”国家里不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还是那个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些条件除了要有“一个可靠的政府”外，还应当对帝国主义的意旨有一个“明确的看法”，采取一些有利于帝国主义經濟渗透的“正义的措施”，有一个“相当大的受教育的优秀分子集团”<sup>①</sup>。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饱尝帝国主义“經濟援助”苦头的“不发达国家”的广大人民，不仅应当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剥削，而且应当迎

合帝国主义的需要，更驯服地充当帝国主义的奴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所谓“不发达經濟学”的“学术”外衣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国新殖民主义辯护。这种“不发达經濟学”把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说成是发达地区同不发达地区的矛盾，富裕地区同贫困地区的矛盾，这样一来，阶级对抗的矛盾就被抹煞了。“不发达經濟学”还说什么发达地区和富裕地区已经不奴役、掠夺和剥削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而是变成“援助”和被“援助”的合作关系。“不发达經濟学”企图通过这些宣传，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散播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以遏制他们的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使他们继续成为、或者重新成为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不发达經濟学”实质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經濟学”，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宣传工具。宣扬这种經濟“理論”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帮办”<sup>②</sup>。

事物发展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帝国主义以自己的掠夺和剥削的罪行，充当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面教员，促进了人民的新觉醒，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识别“不发达經濟学”等形形色色新殖民主义“理論”的反动实质，使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烽火更加熾烈。

① 美国《外交事务》，1961年4月。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2页。



#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

魏文伯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也是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项经常性的根本性的任务。广大农村是社会主义的极重要的思想阵地、政治阵地和经济阵地。农村基层党组织，包括人民公社中的党委和所属支部，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基本纽带，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它必须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并且积极参加农村中可能而且需要实行的科学实验，才能胜利地进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阵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我们华东地区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和全国各地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一样，都是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数次的考验证明，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基层党组织，绝大多数都很好地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作用，都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特别是在近几年来，农村中党的组织反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它们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不怕困

难、艰苦奋斗的优良革命传统，在领导群众同一次又一次严重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在同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群众衷心地拥护它们，称它们是“革命的火车头”、“社会主义的带路人”。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更好地领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必须经常不断地对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清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组织好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团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孤立、分化和瓦解阶级敌人，粉碎他们的进攻；必须坚决执行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问题，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也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要提高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量，还有基层组织建设的许多经常工作要





做，如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严密党的組織生活，加强党的基础知識的教育，經常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发揚党的优良傳統和作風，等等。这里不一一叙述，只着重談談提高农村基层党組織战斗力的几个根本問題。

农村的基层党組織，要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首先就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澤东思想，用階級斗爭的观点，将党员、干部武装起来。階級斗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問題。进行以階級斗爭为綱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提高党员、干部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和无产階級觉悟的必要途徑。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經常反复教导我們，要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爭，要認識到階級斗爭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众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階級的殘余还是存在，資产階級还是存在，小資产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没有結束。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爭，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階級

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sup>①</sup>去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又強調地指出：“在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爭。”<sup>②</sup>无数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論断。但是，过去我們有許多同志对这个問題是認識不足、理解不深的。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既然农业集体化了，生产資料归集体所有，农村中也就没有什么階級和階級斗爭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农业实现集体化以后，农村中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階級，包括地主、富农在內，虽然他們的剝削手段和压迫手段已經被剝夺了，但是他们仍然不会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复辟；广大农民虽然已經走上集体化的道路，但是他们摆脱小生产者的地位还不久，自发的資本主义傾向对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有些人还会走上資本主义的道路，变成新的資产階級分子；社会上还存在着的資产階級的思想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对集体化的农民仍然在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短期内能够清除的；党和国家机关、經濟組織及其他組織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7頁。

② 《紅旗》杂志1962年第19期第4頁。



中，也还会产生一些贪污盗窃分子，投机谋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也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总是要阴谋颠覆和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除了要继续在经济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外，还要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从华东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被推翻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牛鬼蛇神，他们并不都是能够接受改造的，其中有一部分人一有机会就纷纷出笼，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他们的活动花样很多，有明的、暗的，硬的、软的，无所不用，无孔不入。他们活动的主要锋芒又是和我们争夺干部，争夺农民，争夺下一代，妄图篡夺农村基层组织的主导权，瓦解农村中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以达到最后复辟的阴谋目的。像扬剧《夺印》的斗争故事，就出在华东地区的江苏省高邮县甘垛公社小耿家生产队。这样的斗争，并不是个别的。我们所有农村的基层组织，所有党员干部，要永远保持革命的警惕性，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如果我们身在阶级斗争之中，而对阶级斗争这一客观现实不去正视，不去认真考察和思考，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不站起来发动群众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这就无异是在阶级敌人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这样，农村的基层组织就将

涣散无力，就要丧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  
用，就不能有力地领导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  
产斗争，而且就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复辟  
的危险。因此，承认不承认有阶级和阶级  
斗争，是不是去进行阶级斗争，这是一个要  
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或失败的根本  
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不仅表现为敌我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反映到农村的基层组织中来。这就是说，除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复辟活动外，在农民群众中，在干部党员中，由于受到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影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阶级敌人可以利用的某些旧的习惯势力和新的社会风尚之间的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表现为阶级斗争以外，还表现为干部群众之间有关经济利益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等矛盾。只有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严格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发扬民主、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因此，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农民群众内部、基层组织内部、特别是



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以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搞好生产。而要教育好农民群众，又首先要教育好党员和干部。

对农村党员、干部来说，一方面，阶级敌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用剥削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来腐蚀和溶化他们，达到打进来、拉出去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彻底改造他们带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加上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有些党员和干部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容易产生阶级斗争观点模糊、优越感、特殊化、贪图安逸、不求上进等毛病。其中有一些人，就有可能经受不住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的袭击，迷失政治方向，丧失阶级立场；有的不坚定分子，就会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教育农村的党员和干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站稳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要教育党员、干部懂得如何分清是非，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会如何团结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等等。

当前，华东各地农村正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教育，旨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发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提高阶级觉悟，自觉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同自然界作斗争。一般的做法是，在学习有关文件报告的基础上，摆出当地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把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活动，各种牛鬼蛇神、歪风邪气都揭露出来，进行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活的阶级斗争教育。有些地方还把揭发出来的问题集中起来，发动群众讨论，让大家来分清是非，弄清问题的性质，划清敌我界限，研究应该接受什么经验教训，等等，以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有些地方还采取请“四老”（老红军、老干部、老贫农、老职工）讲“四史”（革命斗争史、当地和本村变迁史、互助合作史、家庭翻身史），结合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回忆对比等方法，进行生动而又深刻的阶级斗争史的教育。

通过这样的教育，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大大加强了，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了。对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好比是打了一次防疫针，增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一些阶级斗争观念模糊、思想麻痹的党员干部，擦亮了眼睛，认为再不能蒙在鼓里了；一些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党员、干部，自觉地检查自己，清洗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思想灰尘；至于极少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人，经过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评，也是能够接受党的挽救，重新回头的。广大贫农、下中农群众，年纪大一点的，经过教育后，温故知新，决心翻身不忘本，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些年轻人，原来不懂得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剥削和压迫、艰难和困苦是什么味道，现在也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当前还有阶级敌人，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政治积极性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样，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大大加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进一步得到巩固了。

以上说明，经常地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大讲阶级斗争史，好好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确实是无产阶级教育人、改造人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关于阶级斗争史，不仅现在要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大讲特讲，而且有必要记录下来，编印成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用这个方法教育我们的青年和后代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永不变色。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不要因为抓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忽视和忘记了阶级斗争；相反地，应该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来推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原来有些同志担心抓了阶级斗争会影响生产，事实恰恰说明，抓了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影响生产，而且会推进生产，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二

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

垒作用，还要在一切工作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这就是说，要切实依靠农村中真正可靠的力量，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团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和瓦解阶级敌人。

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问题，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是必须正确解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早在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一开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sup>①</sup>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我们党指导革命、并取得革命胜利的有力的理论和策略武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规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和总方针，领导人民群众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对农村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对中农阶层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其他中农的阶级路线。我们按照这条阶级路线去做，又迅速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这就说明，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贯的阶级路线。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页。



展农业生产，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阶级路线。

可是，现在有些少数基层党组织的同志，由于阶级观念模糊，对于继续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发生某些怀疑和动摇。他们认为：“集体化以后，大家都靠劳动工分吃饭，还分什么贫农和中农，还要什么阶级路线？”“许多贫农已经上升为中农，生活起了变化，不能再依靠他们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在农业集体化以后，是不是还要继续依靠贫农、下中农呢？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知道，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包括老雇农）、下中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他们过去深受地主、富农的剥削和压迫，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他们也最深切地感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因此，他们现在也是最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最热爱集体经济、最坚决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人。同时，他们是农村中的多数。如果我们不依靠他们，那么我们依靠什么人呢？不依靠他们，我们在农村中就要失去最可靠的依靠力量，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阶级敌人就要趁机进行复辟。所以，承认不承认贫农、下中农是我们的依靠力量，承认不承认阶级路线，实际上是一个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感情的問題，是一个阶级觉悟的

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热情地歌颂了贫农的革命积极性，他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sup>①</sup>他又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sup>②</sup>农业合作化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sup>③</sup>只要我們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坚决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不能否认党的阶级路线，就不能否认要依靠贫农、下中农。

眼前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江西省丰城县石溪公社有三个毗连的生产队，生产条件大体相同，但是由于贯彻执行阶级路线不同，工作和生产却是三个样子。一个生产队生产连年上升，社员生活逐年改善。群众说这是“好蔓结好瓜”。这个生产队九个队委委员有七个阶级觉悟比较高的贫农和两个下中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22、22页。

③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7页。



农，他們一心一意團結和帶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他們总是白天劳动，晚上办公，生活儉朴，不特殊化；他們实行民主办队，民主理財，各項賬目日清月結，定期公布。在他們的影響下，社員的思想好，風格高，积极劳动，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經濟。另一个生产队，土质、水源条件很好，可是生产連年下降。虽然两个队长都是貧农，可是这个队的領導权实际上掌握在一个有严重的資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手里。这个富裕中农大量貪污盜竊集体財物，并拉队长下水。社員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一个生产队，队的領導权被名义上为富裕中农实际上为漏网地主的階級敌人篡夺去了，生产一直走下坡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貧农受到打击。这三个生产队的三种不同情况，說明了正确貫徹执行党的階級路綫，建立貧农、下中农的优势，是多么重要！

是不是貧农、下中农在集体化以后生活上，就不能依靠了呢？不。集体化以后，貧农、下中农生活逐步改善，这正是集体經濟优越性的表現，是一种好現象。今天广大貧农、下中农生活的改善，是由于所有制的改变和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的結果。如果我們不断地加强思想教育，生活的改善，只会使他們更加热爱集体經濟，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們的社会主义觉悟只会越来越高，他們的集体主义思想只会越来越增强。毛澤东同志在合作化运动中，就曾經批評了认为土地改革要依靠貧农，合作化不需要依

靠他們的錯誤观点，指出：“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階級的广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將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階級，是比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觉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sup>①</sup>当然，也有极少数貧农、下中农，由于受了資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加之我們教育不够，以致階級界限不清，階級感情淡薄。但是，只要我們重新加强对他們进行階級教育，他們一般都能迅速觉悟过来的。所以，問題的实质是我們加强对他們的教育的問題，而不是一个能不能依靠他們的問題。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階級斗争要依靠貧农、下中农，生产斗争可以不必依靠貧农、下中农，說什么“斗争要走階級路綫，生产要走劳力路綫”，“土改靠貧农，生产靠中农”。显然，这种看法是非常錯誤的。这些同志不了解，貧农、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多数，一向是农村中的主要生产力。在土地改革以前，由于他們遭受剝削和压迫最深，劳动所

<sup>①</sup>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轉变为貧农占优势的按語》。《中國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858頁。



得的大部分被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剥削和掠夺去了。因此，他们生产条件最差，收入少，生活贫困。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发挥什么生产积极性。集体化以后，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条件大大改善，收入增加，政治觉悟和集体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了。贫农、下中农这种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高度积极性，是发展集体生产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些富裕中农虽然生产经验比较丰富，但是他们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不如贫农、下中农坚定，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远不如贫农、下中农高，有的甚至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富裕中农的生产经验，只是个体经营的经验。对于如何搞好集体经济，他们的经验并不如贫农、下中农丰富。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只能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在阶级斗争中是我们坚强的依靠力量，而且在生产上、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也是我们坚强的依靠力量。如果我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依靠贫农、下中农，那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所谓政治上依靠贫农、下中农，也就在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从近几年华东农村的情况来看，哪里的贫农、下中农真正站起来了，形成了阶级优势，哪里的集体生产就搞得热火朝天，哪里的生产就会年年增长，群众生活就会逐年改善。再从全国许多知名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于贫农、下中农这一事实来看，也很有力地说明了在生产斗争中同样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

还有的同志认为，贫农、下中农“意见多、

困难多、麻烦多”，把他们看成“包袱”，不愿意和他们接近，不肯倾听他们的意见，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也是不正确的。对这些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肯提意见，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经济、热爱干部的表现，也正说明他们是我們可靠的依靠对象。我们应该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商量，改进我们的工作。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我们应该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带领他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决不能不闻不问，更不允许责难他们。贫农、下中农又提意见，又有困难，似乎增加了我们基层干部的“麻烦”，但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勤勤恳恳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正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对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缺乏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他们要么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混淆了贫农、下中农同其他中农的区别，要么又忽视团结其他中农，团结农村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对于群众中的意见缺乏阶级分析，不去区别是什么人的意见，是代表哪个阶级的意见，是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少数人的意见。

我们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sup>①</sup>我们党的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其他中农的阶级路线，就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彻底

<sup>①</sup> 《论党》，人民出版社1952年北京第13版，第38页。



的明确的群众路线。前面说到，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农村中的最可靠的依靠力量，是农村中的多数，他们的意见和利益也是代表全体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的。如果农村的基层党组织不去依靠他们，就不可能组织一支坚强的革命的阶级队伍，那么，也就不可能巩固地联合其他中农，把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在农村中的工作就将寸步难行，就不可能动员和组织全体群众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知道，农村中的其他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他们一方面对农业集体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动摇性较大，其中有些人，一有机会就要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劳动者，经过党的教育以后，能够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因此，我们又必须团结他们。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有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建立贫农、下中农的阶级优势，才能不断克服富裕中农的动摇性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保持和巩固同他们的团结。毛泽东同志说：“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sup>①</sup>从这里，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地理解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致了。

总之，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有扫除上

述这些思想障碍，提高认识，才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坚定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党的依靠贫农、下中农，联合其他中农的阶级路线，正确地领导群众前进。

### 三

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还要积极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密切党和劳动群众的联系。

干部党员能不能按照规定的制度，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考验每个干部党员阶级觉悟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劳动群众的先进的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放在阶级觉悟最高和劳动最积极的先进分子手里。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他们应当是政治上的旗手，生产上的能手，应当力争成为劳动模范。这样，我们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就能和群众建立最广泛、最经常、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群众就会和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他们就能及时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状况，及时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同

<sup>①</sup>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按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701页。





时，我們的基层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身作則，就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和激励群众，更好地领导生产，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針、政策和任务。

最近以来，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华东各地农村的基层党組織認真执行了党的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形成了一种新的風尚。現在不仅参加劳动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劳动的天数增加了，干硬活的多了。这对提高基层党組織的战斗力和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坚定干部的无产阶级立場，增进干部同劳动人民的感情，使干部又紅又专，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为了使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件大事坚持下去，使之經常化、制度化，巩固和扩大成果，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認識，增强他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解决經常出現的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

干部参加劳动的問題，实际上是一个思想上的兴无灭資的問題，是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一场大革命，必須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事情很明显，如果要使一个不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真正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員，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立場的干部，这是一场长期的深刻的思想意識上的革命，是一个彻底改造自己的过程。同样，即使对于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农村基层干部來說，

从当干部的第一天起，就自始至终不脱离生产劳动，或者由脱离生产劳动再回到生产劳动中去，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意識上的革命。这是因为，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虽然从小就有劳动的良好习惯，甚至許多人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农民，但是，几千年来剝削阶级輕視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好逸恶劳的思想，也不是对他們沒有影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基层干部近年来滋长了一种錯誤的看法，认为当了干部以后，再同社員一起干活，再下地挑粪，面子就不光彩了，就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了，就“不像一个干部的样子”了。这是一种十分錯誤的思想，必須彻底改变。

的确，好逸恶劳、輕視体力劳动，这是剝削阶级造成的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傳染病。同这种恶习进行斗争，提倡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新風尚，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彻底清除这种恶习，只有在劳动中才能逐渐做到。无论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或者不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都要經常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锻炼自己，才能不断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場。也只有这样，才能經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驗，不致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反之，如果当上干部以后，一下地就嫌累，一挑粪就嫌脏，久而久之，厌恶劳动，逃避劳动，靠誤工补贴吃饭，一方面在經濟上增加了群众的負担，另一方面表明他在心理上已經产生了以特殊者自居的优越感，思



想感情也就变化了，这样，他同劳动人民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剥削阶级的思想病毒就会在他身上找到易于侵入的创口。至于像不像“干部的样子”这个问题，我们要问：什么是干部的样子呢？干部在搞好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一模一样，这才是干部的真正样子。其实，他们所说的干部样子，并不是我们干部的形象，而是旧社会做官的形象。许多地方的事实说明，干部一参加劳动，群众对干部的看法也就变了。过去，群众批评一些不参加劳动的干部一身是“官气”，当他们参加劳动以后，群众就把他们当成“自家人”，“知心人”，自己的阶级兄弟，觉得是可以亲近的，可以信任的，可以把集体的事业托付给他们的。

妨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另一个思想障碍是，有些干部认为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参加劳动是“不务正业”，“好处不多”，“得不偿失”。他们把劳动简单地看成是干部多做几个工分、少做几个工分的小事，是很有限的，而不理解它对我们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有着多么重大的作用。

对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我们决不能作简单的、肤浅的理解。如果从每个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说，的确是有限的。但是，全国干部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集体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就不少了，更重要的是，干部参加劳动后，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情

就舒畅，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他们就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不又是无限的吗？同时，还要进一步了解，有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条，他们就能够集体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取得生产斗争的感性知识，学会生产斗争的真正本领；他们就能通过种试验田，搞农业生产的科学实验，和老农、科学技术人员一道，摸索农业生产斗争的客观规律；他们也就能够在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活动中，及时掌握阶级动向和群众思想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领导好。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sup>①</sup>这就是说，干部参加劳动以后，得到的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是取得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知识和经验，是又红又专，失掉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毛病，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是蜕化变质的危险，这难道能说叫作“不务正业”、“好处不多”、“得不偿失”吗？

在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上，如果片面地强调工作忙，工作和劳动有矛盾，不愿意按规定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思想问题，要

<sup>①</sup>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273页。

朱



首先提高思想認識，解决思想問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承认确实有一个工作与劳动的結合和安排問題。我們不能把劳动和工作对立起来，只管工作，不管劳动；但是也不能只管劳动，不管工作，把工作撇在一边。因为我們是干部，这就要求我們既要做到劳动好，又要做到工作好，工作、劳动两不误。如果只管劳动，不管工作，走上另一极端，那么我們和普通社員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我們农村党的基层組織，要善于組織和安排干部的劳动和工作問題，并經常总结这方面的經驗，使干部参加劳动經常化、持久化，同时又把工作做好。

\* \* \*

要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基层黨組織的战斗力量，要切实解决上述有关提高农村的基层黨組織战斗力的若干根本問題，县以上各級黨組織、尤其是直接領導农村基层黨組織的县委，負有极其重要的責任。县委以上各級黨組織要經常帮助公社黨委和支部了解农村階級斗争的形势，分析各階級的动态，把敌对階級的各种活动集中起来，对群众进行教育，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教育的成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每年都要利用农闲时间集中地搞一两次。县委以上各級黨委还要經常深入檢查基层黨組織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階級路綫的情况，了解貧农、下中农階級队伍的情况，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和他們交知心朋友。对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問題，县以上

領導机关要为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創造必要的条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會議、报表，讓他們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劳动；同时，县以上机关的干部，尤其是領導同志，要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規定，带头下乡去参加劳动，并在劳动中和基层干部一道，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工作与劳动的安排問題。县委以上各級黨組織这样做了，公社黨委和支部也就会跟着做。

加强对黨員干部和群众以階級斗争为綱的社会主义教育，在一切工作中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階級路綫，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問題，是关系我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經濟工作上的几項基本建設，也是我們在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們所有的农村的基层黨組織，必須在上級黨委的领导和帮助下，依靠全体黨員，依靠貧农、下中农，团结全体劳动群众，全心全意，一心一德，认真地、坚持不懈地解决这些問題。随着这些問題的不断解决，我們农村的基层黨組織的战斗力量必将进一步提高，更加成为农村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堡垒。这样，我們农村的基层黨組織也就能够更好地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总路綫偉大紅旗的指引下，不断取得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偉大胜利，为把我国建設成为农业現代化、工业現代化、国防現代化和科学技术現代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